

# 死亡的回忆

—— 奥斯威辛五年

〔波〕维斯拉夫·基拉尔著

# 死亡的回忆

—— 奥斯威辛五年

[波] 维斯拉夫·基拉尔 著

李平 表明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社

Wieslaw Kielar  
ANUS MUNDI  
Fünf Jahre Auschwitz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Main) 1979

根据联邦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菲舍尔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译出

死亡的回忆

〔波〕维斯拉夫·基拉尔 著

李平 裘明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24,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3,500册

ISBN 7-5327-0233-2/K·004

定价：6.16元

## 译 者 的 话

也许是出于忏悔，纳粹德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曾说过：“希特勒是德国的灾星，这是无法逃脱的。”可历史并不这么认为。希特勒绝不仅仅是德国的灾星，而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最大的灾星。他的那个一度猖狂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刻下了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最野蛮的伤痕。希特勒的主要罪恶之一，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残酷地杀害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帝国为建立其所谓的“新秩序”，在其本土和波兰等地构筑了三十多个集中营。在这些集中营里，各种难以想象的杀人手段，全都被创造发明出来了。在纳粹统治的最后日子里，他们在集中营里灭绝人性地杀害了难以数计的手无寸铁的囚徒。“惨绝人寰”，在这里决不是空洞的形容。在这些名为集中营、实为人类屠宰场的人间地狱里，无论是在杀人的规模上，还是在杀人的手段上，无疑要算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最了。

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于1940年6月。随着法西斯侵略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犹太人、波兰人和苏联、英、美的战俘源源不断地被关了进来，集中营的占地面积也随之扩大，最后竟达到了八十公顷。来自四面八方的“囚犯”几乎都葬身于此。1945年5月，在盟军的炮火声中，这座人间地狱终于土崩瓦解了。当年这块充满腥风血雨、喧嚣一时的土地，终于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沉

寂荒凉起来。在整整五个年头中，有人说仅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杀害了一百万人；也有人说不止一百万，而是四百万！在这块令人毛骨悚然的土地上究竟葬送了多少人的性命，恐怕是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本书作者维斯拉夫·基拉尔，1919年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1940年他因参加反对纳粹的波兰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逮捕，时年21岁。同年，他作为第一批囚徒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先后当过护理员、运尸工、文书，乃至囚舍长。他经历了各种难以名状的折磨，逃脱了一次又一次死亡的威胁，居然伴随着奥斯威辛这座人间魔窟从诞生到覆灭，整整度过了五个春秋。对于绝大多数囚徒来说，进了奥斯威辛就绝无生还的希望，而他却凭着自己的机智以及求生的强烈愿望，每当大祸临头，总能逢凶化吉，终于熬到黑暗的尽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正是这个奇迹，使得世界上千百万人有机会能够通过这位波兰作家的回忆录，从一个侧面来了解纳粹德国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从死亡的夹缝中逃遁出来的维斯拉夫·基拉尔，无疑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当他叙述那些令人发指的往事时，居然还那么诙谐，有时甚至令人捧腹。这些囚徒面对着死亡，有其自己的欢乐，也有同伴间的友谊，甚至还有爱情……这一切，在历史见证人的笔下，竟是那样动人。而每当人们掩卷回味时，却感到更加苦涩和压抑。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史更是催人常醒的警钟。人类不能重蹈覆辙，也不会重蹈覆辙。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原著为波兰文，初版于1972年，原名《世界的肛门——奥斯威辛五年》。1979年德译本面世。本书是根据德译本转译的。第

1至66节由李平翻译,第67至108节由裘明仁翻译。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3月

## 前 言

这本书不是小说，但读起来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它是一部文献。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作者的经历，包括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参加的事件均为史实。1940年6月14日，作者和波兰的囚犯一起从塔尔诺夫盖世太保监狱被押送到奥斯威辛，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时年不满二十一岁。第一批囚犯共七百二十八人，一进集中营，他们的名字便不再生效，取而代之的是号码：从31号至759号，号码登上了营花名册，从此他们变成了物件，成了党卫队的财产。

维斯拉夫·基拉尔是290号。他的五年集中营生活就此开始，而且始终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的。这五年间他的命运和集中营的历史紧密相联。

这几百名波兰囚犯进营之日便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之时，囚犯命运中悲惨的一页从此翻开。三个星期前，联络官格哈德·帕利奇——他后来被称为“奥斯威辛的刽子手”——亲自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挑选了三十名德国刑事犯，并将他们带到奥斯威辛。这三十个人的编号从1至30，他们和当时还不足一百人的党卫队驻军组成了集中营的领导管理机构。这些刑事犯是党卫队员的得力助手，充当囚舍长和看守。这些首批进营的七百二十八名囚犯的命运不仅操纵在党卫队员的手里，而且也掌握在刑事犯的手里。作者维斯拉夫·基拉尔在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这样写道：“从这一刻起，我们就成了终年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的号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中营，我们会很快知道的！”

当出版社建议我读一读维斯拉夫·基拉尔回忆录的手稿，并要我为这本书的出版写一个前言时，我曾长时间地考虑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和必要性。

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作品已为数不少，其中不仅有回忆录和日记，而且还有在艺术造诣上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以及历史著作、专题论著和科学研究的成果。除此之外，还有最高国际法庭审判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大头目鲁多夫·吉尔斯（1946年）和1947年在克拉科夫审判四十个党卫队员的记录，以及1963至196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次有关奥斯威辛的审讯材料。

有鉴于此，我在阅读基拉尔的手稿时，自然考虑到是否还有兴趣再出版有关奥斯威辛的书籍。所谓的战争文学已很多，再加上那个时代离我们日渐遥远，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加深了昨天与今天之间的鸿沟。

我本人曾像作者一样经历过类似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样的生活。我的头脑中一直考虑着这样一个问题，他为谁写这本书？是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还是为当年奥斯威辛的囚犯？他们可以在书中找到过去的老相识，这些人今天有的还活着，但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本书也许是为那些很难想象奥斯威辛真实情况的青年人写的吧？

也许这部书稿只是完全自然的一种人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卸下历史的重担。如果当事人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就没人能够说出奥斯威辛的全部真相，而它超出了所有没有这段生活经历的人的想象力。

无论是对战后出生的人，还是对有幸活到战争结束的人来说，奥斯威辛集中营都将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记载。它



是悲惨的,但没有生命,它像一块死气沉沉的墓碑掩饰了这个公墓当年的可怕规模。

那四百万横遭杀戮,继而化为浓烟和灰烬的生灵,在今天活着的人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数字,一个抽象的概念。

不论是四百万这个数字,还是因为他们遭到灭绝人性的屠杀而被剥夺作为人应有的悲欢、理想和情感的权利,都已不可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力。

这就是奥斯威辛的最基本却又是最残忍的事实之一。而基拉尔的这本书正是要唤起人们对三十年前这段血腥的事实的记忆。因此,我认为,本书的出版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作者是奥斯威辛罪恶的直接见证人,从集中营的成立一直到它寿终正寝,他在里面经历了各个阶段。他用全景摄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他把那些自知早晚都得被送上断头台的人再次“送往”奥斯威辛和比克瑙营那些今日已空无一人的工棚和干道。囚犯受到恣意折磨以至惨死在这里屡见不鲜,而且手段越来越惨,规模越来越大。到处都在死人,每天,每夜,甚至每个小时,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

基拉尔在书的开始部分就写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死。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死可以延续这么长的时间。”

他进营刚三天就亲眼目睹一个囚犯是如何结束生命的。他是被看守(看守本人也是囚犯)活活折磨死的,作者为此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个囚犯的死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他借用一种不同凡响的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这件事。当这个受尽凌辱的老人身躯不再会动弹的时候,作者完全像自己受到折磨一样,他说:“但我没有受伤,我想活下去。”

我相信,基拉尔的这一段自白是他生活阅历的总结,是他的

心声。我从中看到了他的奥斯威辛回忆录的基点所在。他的回忆录用大量篇幅反映了同死神搏斗的情景，尽管死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刚开始在厨房后面的砂坑里进行少量的处决，到后来在11囚舍进行集体屠杀。从向心脏注射酚剂，到后来在比克瑙的毒气室里一天结果成千人的性命。除此之外，因为饥饿、身体虚弱和心理上丧失抵抗能力而停止呼吸的，几乎每小时都在发生。面对死神，基拉尔不想屈从，他想活下去。恶梦般的情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基拉尔的眼前，奇怪的是令人胆颤心惊的事实在他眼中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而一些日常小事则变得至关重要。以至于思想上想回避为危及生命、饥饿和严寒所要做的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地下室停尸间里上演的一幕最具有代表性。这儿停放着还没有运往焚尸场的尸体。基拉尔以一种“随便交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盖内克·奥博伊斯基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土豆。地下室里有一个小焦炭炉。我们坐在‘棺材’上围着火炉，煎土豆饼。油饼的香味刺激着鼻子，冲淡了撒在尸体上的氯气恶臭味。我们极其信任这些尸体，相信它们决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时而我吹吹口琴，时而阿利唱唱歌。这里笼罩着一种和谐的气氛，就像在童子军的营火旁……”

这是一个令人愤慨的场景，但是它是真实的，它符合奥斯威辛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艰苦、严格和死气沉沉。当集中营即将完蛋的前夜，一个在停尸间参加庆祝活动的公墓管理人员说：“我们像鬣狗一样啃死人肉……在我们化为灰烬之前，至少腹中有食……”

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全蜕化的可怕的世界里才会形成这样强烈的对比。在基拉尔这部著作中，有关比克瑙营的这一部分的描写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里成千成万的囚犯生活在焚尸场的

熊熊烈焰染红的天空之下并且很快就被化为灰烬。“集中营里的日子，正常地一天天过去，所谓正常，就是说和以往一样。大部分人干着重活，经常受折磨、挨打、‘淘汰’、用煤气毒死、枪毙、受政治处审讯，吃的是一碗洋大头菜或荨麻叶汤，一切根据党卫队官兵的情绪好坏而变，他们主宰着数千名无力自卫的囚犯的生死大权。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甚至连有地位的人都如此——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集中营里已呆了将近四年……政治处经常在集中营里到处窥探，我们必须当心密探和卖力过头的担任职务的囚犯，还要当心越来越频繁的转运。他们说是把囚犯运到德国的腹地，但谁也难保究竟是否运到某个毒气室。”

党卫队制定的规章制度就是要把囚犯从肉体上一个个消灭掉，事实也是如此。在这之前，还得扭曲他们的心理，抹掉他们的灵魂，除掉他们做人的尊严。这也是一种罪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规章制度的牺牲品。人会以一种本能的灵敏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感情，带着自己的梦幻顽强地保卫自己。

在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与一位姑娘谈情说爱，这样的写照是多么独特。基拉尔这样写道：“只要有空闲，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和她厮守在一起，两个人谈呀，说呀——这也许太天真，对一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这也许太天真了，我们谈玫瑰色的童年、家庭、远足、锻炼、电影、初次约会……一句话，我们谈我们幸福的青年时代的一切。我们手拉着手，眼睛看着眼睛，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忘掉了困苦、饥饿、寒冷、肮脏、寄生虫、注射化学药剂、进毒气室、‘淘汰’和集体屠杀……忘掉了我们的灭亡。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一起品尝着这个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之所以说它是柏拉图式的，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爱情不属于另一种肉体的爱情。”

以奥斯威辛的恐怖为背景,这对恋人似乎是幅不可理解的图画。作者自己也如此声称,这和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他引用了一个囚犯的看法作为辩解:“他们俩正在谈着恋爱,但他们也逃不脱这该死的厄运。”这自然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它通俗地解释了他们在重压之下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样的爱情实质上只是一种憧憬,是想从残酷的现实中向另一个世界逃遁,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和期求。另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是想家,思念亲人,梦幻回到他们的身边。“我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只包裹,包裹很小,这似乎说明父母亲的境况不佳……”基拉尔写道:“每次收到家信或包裹,我好像尝到了与家人诀别的味道。甜蜜的生活记忆犹新,越是清晰,越是感到生活在营铁丝网后面是那么的不幸和无望……我想家,又想起战争,想起营、毒气室、酚剂、‘淘汰’和清洗,还想起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同伴们。我回想着我这不幸的命运,尽管我也有幸福。最后,我想到了明天和以后的岁月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我是否会获得自由,当然,对此只能是空想了。”

基拉尔这本回忆录的价值还不在于此。他不仅再现了事实,而且以事实为基础描绘了各式各样的人:好的和丑的,高尚的和卑劣的。这不仅仅是他观察的结果,而且也是他的敏感性以及他的细腻的气质的反映。因此,他的回忆录与其他众多的同类回忆录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

关在集中营的这几年,他换过好多个营区:在所谓的奥斯威辛集中营I、在哈孟湖小营、在布纳厂-莫诺维茨村,最后又在比克瑙。每换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宽阔的视野,他的处境和地位都不同。在他的奥斯威辛“升迁”史上,他曾扮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医院的护理员、运尸工、劳动分队的文书、禁闭室的囚犯、安装工、劳动分队的负责人(所谓的领工员)。他作为一名老资

格的囚犯担任过各种职务，而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后不久的年代里担任过名声很坏的职务——囚舍长。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达到了营级的顶峰。（那时候，大多数囚舍长已由政治犯担任，而不是刑事犯了。）

作者一直回避这个可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可以左右其他人命运的职务。就这点而论，作者走上营级的顶峰的全部道路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位子交给他，他是想竭力摆脱的。在这一恶劣的环境下，他想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想独立。他非常清楚，这个权力极易使自己走向在营中受煎熬的同伴们的反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权力将腐蚀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幼稚者。”

作者在营中担任各种职务使他有可能会收集不仅涉及囚犯，而且也涉及党卫队驻军的各种资料 and 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成为营内的头面人物之一。因此，他和许多党卫队员有了直接的交往，并不总是工作上的关系。为此，他的回忆录所反映的集中营的图景，不是一个普通囚犯眼睛所看见的图景，不是千万个依靠自己的拳头、友谊、熟人或者自己所在的小组来试图结束自己命运的囚犯所看见的图景。

基拉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后期阶段已属于“营上层人物”。他生活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这里只能反映千万个普通囚犯真实情况的一个侧面。然而，不管是这个小小的上层世界，还是忍饥受饿、受尽凌辱、长满虱子的囚犯，都受到同样可怕的威胁，都有同样死亡的危险。

我以为，这本回忆录的优点不仅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集中营的生活，而且首先是它不加任何掩饰忠实而又残忍地揭开了这一生活中人们观点的多样性。我们再补充一点，所谓观点，不仅包括囚犯的观点，而且也包括党卫队员的观点。他们在这

本书中是人,不是用黑纸剪出来的剪影,他们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但不是一直由同样的动机所支配的人。在他们中间可以找到自相矛盾的人,他们故意完成他们的罪恶勾当,但他们也帮助自己的牺牲者,还和他们共事。是出于贪欲?是出于对酒和金钱的癖好?是出于心底里隐藏着的同情心?或者甚至是对藏在带有骷髅头的制服里的、教他们屠杀和仇恨别人的信念的怀疑?党卫队的代表在这本书里不仅仅是会杀人的机器人,而是“给人们带来厄运的人”,是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后——他们的统治害怕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崩溃——有了人性反思的人,他们充满了承担责任的恐惧并害怕失去购买来源。在基拉尔回忆录中不乏大量的评注、观察和事件。譬如,食品仓库的头头,那个外号叫“瑞典佬”的党卫队员自动弥补仓库里缺少的食品,他明知食品是被囚犯偷去的,但是他不接受教训。相反,他填补了由于他们而造成的空缺。“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的心好,”基拉尔写道,“他也偷。”他想掩盖自己的过错,因此,囚犯们逃脱了惩罚。

这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比克瑙的那些头面人物在1943年圣诞之夜举办的节日庆祝活动,它使人回忆起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sup>①</sup>的巨著:“圣诞节庆典场面颇为壮观。宴席上有肉、禽、火腿、各式香肠和烧酒。席间的气氛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身陷囹圄的人,酒酣饭饱,增加了大家的乐观情绪。此外,外面传来的消息也鼓舞人心,无往不胜的希特勒军队,撤退到了‘预定的位置’,盟军飞机的空袭,使德军的后方乱成一片。集中营里人人皆知的那句惯用语‘且待春天’,现在终于有了比较现实的根据。我相信,在这

---

<sup>①</sup> 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1922—1951),波兰作家、诗人,1943—1945年间被囚于奥斯威辛集中营。——译者

些天中，因食物充裕，我们已对残酷的现状失去了知觉：焚尸炉未停止冒烟，仍吞噬着一堆堆尸体；除了被枪杀、被注射毒物致死和被‘淘汰’的人之外，每天还有数十人正常死亡”。这次庆祝活动最残酷之处在于，与此同时，比克瑙营里成千上万形容枯槁、饥肠辘辘的囚犯在毒气室旁和焚尸场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不仅如此，这次庆祝活动恰恰在所谓的“加拿大”营附近举行，就是说，在党卫队的几十间工棚——那里收藏了从被害者那儿掠夺来的财物——附近举行。

“甜丝丝的焚尸的烟云带着成团的雾瘴，笼罩了整个地区。”基拉尔这样写道，“与此同时，‘加拿大’营的囚犯正在月台上大汗淋漓地干活，这里正在进行再一次的分选。在几个党卫队士兵的看守下，他们分选着毒死在煤气下的人们的财产。满载着箱子、提包和行李的汽车，一辆接一辆驶往物资营里的仓库，所有的财物将在这里再次受到分拣——这次是很仔细的分拣。”

这是1942年至1944年底在比克瑙司空见惯的情景之一。比克瑙被党卫队医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蒂洛称之为“世界的肛门”。他的同事、党卫队医生、大学教授、药理学和哲学博士约翰·保罗·克勒默在1942年9月5日曾写过一段文字，同意他的看法：“今天中午女营发生了一件特别事件，可怕之极。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蒂洛医生言之有理，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的肛门处。”克勒默所说的可怕之极的特别事件是指处死八百名女囚之事，这同在比克瑙灭绝四百万人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驻地医生海因茨·蒂洛称这个地方为世界的肛门。这种说法无疑表明了每个目击者对这个集中营的厌恶和恐惧，”著名的精神病科医生、教授安东尼·凯平斯基在他所著《生活节奏》中这样写道，“另一方面它用洗涤世界的必要性来解释集中营的存在。就希特勒灭绝营来说，这种说法，除了最有效最经济地消灭

敌人这一直接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之外，还有一个较深刻的意义，就是纯洁日耳曼民族，这与日耳曼是高等民族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认为，对这种说法作如此解释非常确切。如果出版社将这个说法当作基拉尔回忆录的题目，其原因不外乎：1，它以既简单又简短的形式反映了这个灭绝营的作用；2，《世界的肛门》，如安托尼·凯平斯基所写，向世界揭示了一个人所有的秉性和气质！除了残暴的兽性那就是英雄、牺牲精神和爱情。我相信，《世界的肛门》这个题目说明了一切。特别是基拉尔这样写道：“‘加拿大’营！焚尸场在冒烟也罢，在填满被煤气毒死的人的沟坑中，人的油脂在火焰中滋滋地响也罢，这都毫无关系。集中营有了足够的食物！集中营松了口气，因为忙于运囚犯的党卫队员们喝醉了酒，就没兴致再来管集中营里的活人。他们寻找金子，塞满口袋，他们要保障自己的未来。那些工人和‘加拿大’营的囚犯也这么干，为了改善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生活，他们需要这些首饰。特别分队的成员服从党卫队的命令，甚至筛开了尸灰，在其中寻找未被烧熔的钻石。从牙齿上取下的金子被熔铸成金条’送往帝国的腹地，以充实已处于崩溃的国家银行。”

这是已经变成灭绝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拼盘。死亡、偷窃、被送进毒气室窒息至死的人群和每次运来新的囚犯时营里的轻松气氛。这轻松来源于这个希望，就是党卫队员的贪婪可能给营里的囚犯制造一次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为之而延长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也许那些濒临死亡的囚犯带进营的食品垃圾可以使营厨房供应的汤稍许浓一些，这样的汤至少可以抵挡一下饥饿，这样的汤竟然成了延长生命的希望之光。

这也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事实。真实情况就这些吗？



迄今为止无人说出全部真情，也许也没人能说出它的全部真情。囚犯在营里遭遇的全部真相将由这么多人各自的感觉、经历、冲突、戏剧性的事件、各自的失败和悲剧以及实现的和没有实现的希望所组成。这不仅包括那四百万直接被屠杀，以及来不及在营花名册上登记的囚犯，而且也包括那些注册编号的囚犯。

维斯拉夫·基拉尔的这部著作除了它的历史价值外，还有一定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这部书不仅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编年史，而且具有一种深刻的含义。它以并非老一套的、诚实的乃至残忍的方式再现了在非人的年代里注定是生或是死的那些人。那个年代是善与恶，人道的信仰和希望与对人格的侮辱进行斗争的年代，也是一个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有的人是强有力角色，有的人是弱小的或不堪一击的角色。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前者常可赢得原来的地位和尊严。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英勇的，虽说很平凡，也不崇高，更不至于可以树碑立传，但却是单纯的和人道的。

我把这本著作介绍给读者，相信它能引起读者深刻的思考和反应。它特别真实地揭露了集中营的恐怖制度以及德国法西斯主义灭绝人性的罪恶。人民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米耶奇斯拉夫·基耶塔